



*John Dewey*

# 杜威教育文集

DUWEI JIAOYU WENJI

吕 达 刘立德 邹海燕 主编

第 4 卷

If we are willing to conceive education as the process of forming fundamental disposition, intellectual and emotional, toward nature and fellow-men, philosophy may even be defined as the general theory of education. Unless a philosophy is to remain symbolic-or verbal-or a sentimental indulgence for a few, or else mere arbitrary dogma, its auditing of past experience and its program of values must take effect in conduct.

人民教育出版社

吕 达 刘立德 邹海燕 主编

# 杜威教育文集

第 4 卷

人民教育出版社

·北京·

**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**

杜威教育文集. 第4卷/吕达, 刘立德, 邹海燕主编.

—北京: 人民教育出版社, 2005

ISBN 978-7-107-18528-1

I. 杜...

II. ①吕... ②刘... ③邹...

III. 杜威 (1859—1952) —教育思想—文集

IV. G40-0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027918 号

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

网址: <http://www.pep.com.cn>

人民教育出版社印刷厂印装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2008年1月第1版 2009年5月第2次印刷

开本: 787毫米×1092毫米 1/16 印张: 31 插页: 2

字数: 375千字 印数: 1 001~4 000册

ISBN 978-7-107-18528-1 定价: 44.50元  
G·11617

如发现印、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。

(联系地址: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17号院1号楼 邮编: 100081)

## 编者说明

一、杜威 (John Dewey, 1859—1952) 是世界教育史上伟大的教育家、哲学家, 对世界教育的发展产生了并正继续产生着深远而广泛的影响。为了满足广大读者, 特别是教育科研工作者、师范院校师生和中小学教师学习和研究杜威教育思想的需要, 我们在 2002 年杜威逝世 50 周年之际, 开始选编《杜威教育文集》; 至 2004 年底杜威诞辰 145 周年之际竣稿, 后又曾多方征求意见。

二、《杜威教育文集》收录了杜威的主要教育论著, 也酌收了少量与教育有密切关系的其他论著, 共计五卷。选文以年代为顺序, 具体内容和译者如下。

第一卷, 选编了杜威 1897 年至 1915 年撰写的《我的教育信条》、《学校与社会》、《儿童与课程》等 6 种教育名著。主要译者为赵祥麟、任钟印、吴志宏、顾岳中。

第二卷, 选编了杜威 1916 年撰写的著名的教育专著《民主主义与教育——教育哲学导论》。译者为王承绪。

第三卷和第四卷, 选编了杜威 1919 年 4 月底至 1921 年 8 月在华的主要教育讲演: 第三卷是著名的《杜威五大讲演》, 也就是在北京的系统讲演; 第四卷包括著名的《杜威三大讲演》, 也就是在南京的系统讲演, 以及在其他各地的讲演。主要译者为胡适等。

第五卷, 选编了杜威 1920 年至 1952 年撰写的 15 种著名的教育论著。主要译者为王承绪、赵祥麟、姜文闵、金冬日、赵端瑛、顾岳中等。

三、每卷书前均选编了相关的图片资料, 以及译者或有关专家撰写的“本卷前言”(第三、四卷背景相同, 合用一个前言),



希望对读者的阅读和研究有所裨益。

四、为了使读者对杜威其人的全貌、活动的轨迹及思想的脉络有一个完整的了解，我们在每卷书末加了一份相当权威的附录《杜威生平和著作年表》；第三卷书末还附录了《杜威与中国》和《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在近代中国》。

五、本书选编的杜威教育论著，是由众多专家学者进行翻译的。我们在相应的位置注明了译者姓名。在此谨再次向他们致敬鸣谢。

六、中国教育学会会长、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顾明远，浙江大学教授王承绪，中国教育学会顾问、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瞿葆奎，华中师范大学教授任钟印等专家学者对本书编选给予了大力指导；中国国家图书馆、人民教育出版社图书馆、北京大学图书馆、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有关同志，北京大学蒋凯同志，北京师范大学董乃强同志等在资料搜集方面提供了大力帮助。谨此一并致谢。

七、由于论著的翻译出自众人之手，尤其是杜威在华讲演，随讲随译随记，体例和译法难免有不尽一致的地方。有些人名、地名和术语的译名，用的是当时的习惯用法。此次我们选编时，进行了必要的技术性校订；但是凡不致影响阅读的文字均维持原貌，以真实地反映当时的学术风格和流变。杜威在华各次讲演的时间和地点，有的记载十分明确，有的记载则不甚明确；尤其是对杜威教育论著和讲演中所蕴涵的思想的确切体认和理解，实赖有关专家学者和师生专门的研习和解读。

八、囿于编者水平，本书不当甚至错漏之处，恳请读者不吝指正为盼。

编者

2007年12月于北京

## 本卷前言\*

在赫尔巴特学派的教育学步入我国之际，以近代而言，西方其他教育学说也陆续来华，如洛克、卢梭、裴斯泰洛齐、福禄培尔、斯宾塞、尼采的教育思想，以及拿托普（P. Natorp）的社会教育学等。特别是由蒋维乔译的日本吉田熊次著的《新教育学》（商务印书馆，1909），是与“以往之教育学”即“18世纪之个人主义为立脚地的教育学相区别”，介绍了西方社会教育学说的教育学。它意味着教育学不仅要着眼个人的发展，同时要关注社会的进步，开展了教育学的新生面。当然，在影响上这些都不能与赫尔巴特学派的教育学匹敌。不过，他们多少“阻遏”了赫尔巴特学派独占中国的教育学天下。我国当时的教育学画面还是有其色彩的。

1892年，私淑与受教于莱因的美国学生德加谟（C. DeGarmo）、麦克默里兄弟（C. A. McMurry & F. M. McMurry）等发起，在美国组建“赫尔巴特学社”（Herbart Club）。

\* 本文原是瞿葆奎先生撰写的《中国教育学百年》的一部分。《中国教育学百年》一文收入瞿葆奎先生的自选集《教育学的探究》，2004年12月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。作者2004年12月在该文的题解和脚注中说，该文“应当年《教育研究》连瑞庆主编之约于1998年初开始撰写。曾以上、中、下篇分别刊于《教育研究》1998年第12期，1999年第1、2期。自发表迄今已逾六年了。再读稿，错漏不少；且近年来一些著作、论文直接或间接反映了中国教育学的百年，既应勘误、补充，又应学习、引用，于是再反复改稿。然而讹误、阙失尚多，至愿正讹、匡阙。”又说，“本文先后十易，乃成初稿发表。熊川武同志参加了头稿的撰写。”此次作为“本卷前言”，瞿先生又对本文进行了修改、补充。





1895年，又仿照耶拿大学成立了“全国赫尔巴特教育科学研究学会”（National Herbart Society for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Education），简称“全国赫尔巴特学会”（National Herbart Society）。杜威当年也是这个学会的理事。他的论文，如：

《兴趣与意志训练的关系》（*Interest in Relation to Training of the Will*），载《赫尔巴特学会年报》（1895）。

《文化分期理论的解释》（*Interpretation of the Culture-Epoch Theory*），载《赫尔巴特学会第二年年报》（1896）。

《教育基础的伦理学原理》（*Ethical Principles Underlying Education*），载《赫尔巴特学会第三年年报》（1897）。<sup>①</sup>

只是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，“杜威才成为了杜威”。也许可以认为，杜威的《我的教育学信条》（*My Pedagogic Creed*）（1897）是其重要标志。

1901年<sup>②</sup>，全国赫尔巴特教育科学研究学会又改名为“全国教育科学研究学会”（National Society for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Education），在这里，它脱掉了“赫尔巴特”的“帽子”。1910年再改为“全国教育研究学会”（National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Education, NSSE）<sup>③</sup>。20世纪初，原

① 吴俊升：《增订约翰·杜威教授年谱》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，第34、36页；简·杜威著，单中惠编译：《杜威传》（附录二）杜威著作目录，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，第88~89页；杜祖贻著，陈汉生、洪光磊译：《杜威论教育与民主主义》附录杜威早期著作目录（1882~1898），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，第111~112页。

② 下页注①的三书均为1902年，误 [See S. Jaszczak (Ed.), *Encyclopedia of Associations*, 31st ed., 1996, p. 1014. 这是西密歇根大学沈剑平教授给我邮来的材料]。

③ F. Eby & F. Arrowood, *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Education*, 1934, 19th printing, 1946, p. 787. W. F. Connell, *A History of Education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World*, 1980, p. 61. 滕大春：《美国教育史》，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，第614~615页。



来那些赫尔巴特学派的中坚，像德加谟、麦克默里兄弟等，逐步地疏离赫尔巴特学派，逐步地坚定地走进杜威学派了。<sup>①</sup>

就国际范围的潮流来说，赫尔巴特学派的教育学影响将近半个世纪，它的全盛时期，也许是在1880年左右到1910年左右；20世纪开始未久，就逐渐地倾向于杜威的实验主义教育学。在国际范围说，实验主义教育学大致也影响了将近半个世纪。孟宪承教授当年曾对我说：“两个学派，一个世纪！”它们有它们各自出现的年代。真是“每个原理都有其出现的世纪”<sup>②</sup>。

我国以翻译日本的教育学为主、以自己编著为辅的局面并没有维持多久。至1915年左右，无论是“翻译”还是“自己编著”，都进入了低谷。这意味着这一阶段已近尾声了。

杜威的实验主义教育学早在20世纪初期，就开始在我国传播了。例如1912年，蔡元培在《对于教育之意见》中，以及1915年在巴拿马举行的万国教育会议上提出的《1900年以来教育之进步》、1918年在天津中华书局直隶全省小学会议欢迎会上的讲演《新教育与旧教育之歧点》，都点到了杜威的教育思想。1919年杜威来华前夕，他在北京青年会的讲演《贫儿院与贫儿教育的关系》说：“美国大教育家杜威博士，不久要来中国。他创了一种很新的教育主义，即工即学，是要学校

---

<sup>①</sup> W. F. Connell, *A History of Education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World*, 1980, p. 69. 康内尔著，张法琨、方能达、李乐天等译：《20世纪世界教育史》，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，第139~140页；康内尔著，孟湘砥、胡若愚主译，周定之、张文庭校：《20世纪教育史》，湖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，第120页。

<sup>②</sup> 马克思：《哲学的贫困》，载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》第1卷，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，第146页。





生活与社会生活密接。”<sup>①</sup>

我国一些期刊对杜威的教育思想也有过介绍。例如，商务印书馆的《教育杂志》于1917年4月就刊出过天民（朱元善）的《台威氏之教育哲学》（第9卷第4号）（按：台威即杜威），系摘译杜威《民主主义与教育》（*Democracy and Education*）（1916）的第24章《教育哲学》（*Pilosophy of Education*）；同年9月，天民的《台威氏明日之学校》（第9卷第9号），系介绍杜威与他长女伊夫琳·杜威（Elelyn Dewey）合著的《明日之学校》（*Schools of Tomorrow*）。1918年1月、3月和4月，又刊出了天民的《今后之学校》（第10卷第1、3、4号）的连载，系摘译《明日之学校》；等等。

1919年，应北京大学、南京高等师范学校、江苏省教育会、浙江省教育会等单位的邀请，杜威访华。<sup>②</sup>当年他60岁。

他来华前，3月上旬，胡适以《实验主义》为题目，在当时北平的教育部讲演四次，内容包括七个部分：一、引论；二、皮尔士——实验主义的发起人；三、詹姆士的心理学；四、詹姆士论实验主义；五、杜威哲学的根本观念；六、杜威论思想；七、杜威的教育哲学。<sup>③</sup>这确是一篇了解杜威实验主

---

<sup>①</sup> 蔡元培：《贫儿院与贫儿教育的关系——在北京青年会演说词》（1919年3月15日），载高平叔编：《蔡元培教育论著选》，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，第183页。

<sup>②</sup> 王剑：《胡适与杜威的中国之行》，对邀请单位有辨正，载《社会科学研究》2003年第1期。

<sup>③</sup> 其第一至第四部分，发表于《新青年》第6卷第4号（1919年4月）；其第五和第七部分，发表于《新教育》第1卷第3期“杜威号”（1919年4月）；其第六部分，发表于《新中国》第1卷第2号（1919年6月）。《实验主义》的全文，集于《胡适文存》第1集第2卷，亚东图书馆1921年版，第409~479页。胡适在文末署：“民国八年春间讲演，七月一日改定稿。”



义不可不细读的入门之作。

3月31日，陶知行（行知）在《时报·教育周刊·世界教育新思潮》上，发表了《介绍杜威先生的教育学说》。4月，商务印书馆的《教育杂志》（第11卷第4号）刊出了杜威的肖像插图；4月的《新教育》（第1卷第3期）<sup>①</sup>为专号“杜威号”，登载了《杜威先生传略》、杜威肖像、杜威夫妇参观《申报》馆时与史量才、张竹平暨胡适、蒋梦麟、陶知行的合影，以及胡适的《杜威哲学的根本观念》和《杜威的教育哲学》；蒋梦麟的《杜威之伦理学》和《杜威之道德教育》<sup>②</sup>；刘经庶（伯明）的《杜威之论理学》；朱进的《教育与社会》，为杜威来华的讲演开道。这一期的《新教育》还刊出了5月2日胡适在江苏省教育会一个半小时的《实验主义》普及性讲演，说是替杜威“先开辟出一道儿，再加些洒扫功夫”。他在给蔡元培校长的信中也说：“昨（按：5月2日）晚上我在教育会讲演实验主义大旨，以为他明日（按：5月3日）讲演的导言。”<sup>③</sup>还刊出了杜威来华后的首场讲演《民主主义与教育》——5月3~4日在江苏省教育会的讲演，由蒋梦麟翻译。

随着杜威在1919年五四运动前四天，即4月30日下午抵

---

① 显然，这一期的《新教育》是延期发行的，因这它包含了5月的史实。

② 《新教育》第1卷第3期，载蒋梦麟的《杜威之伦理学》和《杜威之道德教育》为前后两篇。前篇署名，后篇未署名。或谓蒋文前篇为《杜威之人生哲学》，与《新教育》第1卷第3期题目在形式上未符，文字也有所改动。或谓《杜威之道德教育》为胡适的论文，误。1919年7月6~9日《民国日报·觉悟》转载《杜威之道德教育》，署名胡适，误。

③ 1919年5月8日《北京大学日刊》。



达上海，<sup>①</sup>到1921年7月11日离京，8月2日离青岛经日本

① 《申报》(1919年5月1日，第十版)：“杜威博士为美国大思想家、大教育家……兹于昨日(30日)下午到沪。到码头欢迎者有北京大学代表胡适之、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代表陶知行、江苏省教育会代表蒋梦麟。(浙江省教育会代表经子渊，因杜威博士到沪日期不定，不及来沪)……”《民国日报》(1919年5月1日，第十版)：“杜威博士为美国大思想家、大教育家……兹已于昨日(30日)下午到沪。到码头欢迎者，有北京大学代表胡适之君、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代表陶知行君、江苏省教育会代表蒋梦麟君。(浙江省教育会代表经子渊君，因杜威博士到沪日期不定，不及来沪)……”《时事新报》(1919年5月1日，第四版)：“杜威博士为美国大思想家、大教育家。兹于昨日(30日)下午到沪。到码头欢迎者，有北京大学代表胡适之君、南京高等师范学校陶知行君、江苏省教育会代表蒋梦麟君。(浙江省教育会代表经子渊君，因杜威博士到沪日期不定，不及来沪)……”北京《晨报》(1919年5月2日第三版)：“美国哲学家抵沪”，“杜氏已于前月(按：指4月)27日由日本神户乘船来华，于30日抵上海。”上海英文周刊《密勒氏评论报》(1919年5月3日)，也报道杜威夫妇已于4月30日下午抵达上海。

黎洁华：《杜威在华活动年表》(上)，载《华东师范大学学报(教育科学版)》1985年第1期；简·杜威著，单中惠编译：《杜威传》(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，第2、50页编者注<sup>②</sup>、第76页)；赵祥麟编译：《杜威生平和著作年表》(载杜威著，王承绪译：《民主主义与教育》，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，第397页)等，是确切的。不少论著说杜威5月1日到达上海，不确。杜威在北京讲《教育哲学》中，曾误记：“我到中国是5月1日”(载《杜威五大讲演》，第255页)。就连4月30日下午为首去码头迎接杜威的胡适，也误记为杜威是1919年5月1日到上海的。如胡适：《杜威先生与中国》(载1921年7月11日《晨报》，又载1921年7月13日《民国日报·觉悟》，再载《东方杂志》第18卷第13号，1921年7月)，以及胡适：《杜威在中国》(载葛懋春、李兴芝编辑：《胡适哲学思想资料选》(上)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，第555页；又载《哲学译丛》1964年第3期)。但他在当年5月3日给蔡元培的信中说：“杜威博士夫妇于30日午到上海，蒋(梦麟)、陶(知行)和我三人在码头接他们……”(载1919年5月8日《北京大学日刊》)。

本来，4月30日与5月1日，早一天晚一天，无关宏旨。只是还历史的本真耳。



回国<sup>①</sup>，他在中国曾作了两百多次讲演——实验主义教育学在我国的传播达到了高峰。

他来华前后在报刊上发表了她的众多讲演的译文全文、摘要或报道；他旅华期间和离华以后，一些研究者发表了不少论文（见本书附录二，这个附录也是不完全的计数）。

杜威的重要教育著作，主要是在我国 20 世纪 20~40 年代陆续翻译出版的（以原著出版先后为序）。例如：

《我的教育学信条》（*My Pedagogic Creed*）（1897），郑宗海译：《杜威氏之教育主义》，载《新教育》第 1 卷第 2 期，1919 年 3 月。<sup>②</sup>

《学校与社会》（*The School and Society*）（1899），刘衡如译，中华书局，1935。

《儿童与课程》（*The Child and the Curriculum*）（1902），郑宗海译：《儿童与教材》，中华书局，1922。

《德育原理》（*Moral Principles in Education*）（1909），元尚仁译，中华书局，1921；张铭鼎译，商务印书馆，1930。

《我们怎样思维》（*How We Think*）（1910），刘伯明译：《思维术》，中华书局，1929；1933 年第 2 版；孟宪承、俞庆棠译：《思维与教学》，商务印书馆，1936。

《教育中的兴趣与努力》（*Interest and Effort in Education*）（1913），张裕卿、杨伟文译：《教育上的兴味和努力》，商务印书馆，1923。

《明日之学校》（*Schools of Tomorrow*）（与伊芙琳·杜威合著，1915），朱经农、潘梓年译，商务印书馆，1923。

---

① 过去往往讲杜威于 1921 年 7 月 11 日“离京回国”，其实杜威“离京”后并未马上回国，而是再莅山东，在山东游历和讲演了二十多天，是在 8 月 2 日才离青岛经日本回国的。（王剑：《胡适与杜威的中国之行》，载《社会科学研究》2003 年第 1 期。）

② 据吴俊升：《增订约翰杜威教授年谱》，第 36 页：“前有郑宗海译本；后有曾昭森，1959 年香港出版。”



《民主主义与教育》(*Democracy and Education*) (1916), 邹恩润译、陶知行校:《民本主义与教育》,商务印书馆,1928;“万有文库”本5册,商务印书馆,1929。

《教育科学之源泉》(*The Sources of a Science of Education*) (1929),张岱年、傅继良译,天津人文书店,1932;邱瑾璋译,商务印书馆,1935。

《经验与教育》(*Experience and Education*) (1938),曾昭森译,商务印书馆,1940;李相勳、阮春芳译,文通书局,1941;李培圉译,正中书局,1943。

1939年,拉特纳(J. Ratner)编辑杜威的《旧个人主义与新个人主义》(*Individualism, Old and New*) (1930)等论文,集为《现代世界中的智慧》(*Intelligence in the Modern World*),赵一苇等译,台湾世界书局,1960。

1940年,拉特纳编辑杜威的《我的教育学信条》以及其他五篇论文,集为《今日的教育》(*Education Today*),童时光译,商务印书馆,1946。

1952年,杜威为克拉普(E. R. Clapp)女士的《教育资源的使用》(*The Use of Resources in Education*)一书写了“引言”(Introduction);克拉普女士在杜威《民主主义与教育》出版前曾阅读原稿,并提出批评与建议(赵祥麟译,载赵祥麟、王承绪编译:《杜威教育论著选》,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,1981,第430~435页;又载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、杭州大学教育系编译:《现代西方资产阶级教育思想流派论著选》,人民教育出版社,1980,第47~52页)。这是他发表的最后著作了,是年杜威93岁。

此外,杜威的一些弟子和进步教育派代表人物的一些著作,也在这个时期陆续传入,并译出版。

在长达两年零三个月的时间里,杜威的足迹遍布中国 13



个省市的讲学，<sup>①</sup> 口头传播他的实验主义教育学。如江苏省教育会的贾丰臻说的：“按博士之言，真是至情入理。”<sup>②</sup> 也许可以说，这是当年教育界的普遍观感。

梁启超在当年也是邀杜威来华的积极支持者和赞助人。他曾说：“自杜威到中国讲演后，唯用主义或实验主义在我们教育界成为一种时髦学说，不能不说是很好的现象。”<sup>③</sup> 他还表示：“中国人宜以杜威哲学为底，造出一派新的哲学来。”<sup>④</sup> 陈独秀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认为实验主义可以与唯物史观并存，表示“相信尊重”实验哲学。<sup>⑤</sup> 1921年4月底，杜威赴广东讲演，时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的陈独秀，主持了杜威在广州高等师范学校的首场讲演，并介绍了杜威的简历。<sup>⑥</sup> 在历史上，当年毛泽东于《湘江评论》的发刊宣言中曾说，当前“中国就成功和将要成功方面的改革”，“见于思想方面，为实验主义”，把实验主义看为思想领域的指导性学说。<sup>⑦</sup>

胡适在1921年7月11日杜威离开北京时有这样的话：“自中国与西洋文化接触以来，没有一个外国学者在中国思想界的影响有杜威先生这样大的。”<sup>⑧</sup> 就当年来说，这话没有什

---

① 黎洁华：《杜威在华活动年表》（上、中、下），载《华东师范大学学报（教育科学版）》1985年第1、2、3期。认真说来，应该是胡适在《杜威先生与中国》中说的，是“十一省”。那时的北京、上海分属直隶省、江苏省。

② 贾丰臻：《聆杜威博士讲演教育者之天职赘言》，载《教育杂志》第12卷第6号（1920年6月）。

③④ 梁启超：《颜李学派与现代教育思潮》，载《东方杂志》第21卷第2号（1924年1月）；《五团体公饯杜威席上之言论》，载1922年7月1日的《晨报》。转引自元清：《杜威的中国之行及其影响》，载《近代史研究》2001年第2期。

⑤ 《本志宣言》，载《新青年》第7卷第1号（1919年12月）。转引自元清：《杜威中国之行及其影响》，载《近代史研究》2001年第2期。

⑥⑦ 元清：《杜威中国之行及其影响》，载《近代史研究》2001年第2期。

⑧ 胡适：《杜威先生与中国》，载葛懋春、李兴芝编辑：《胡适哲学思想资料选》（上），第181页。



么泡沫。

吴俊升为纪念杜威逝世 30 周年所撰的《年谱》中说：“中国教育所受外国学者影响之广泛与深远，以杜氏为第一人。杜氏所及于国外教育之影响之巨大，亦以中国为第一国。”<sup>①</sup>就新中国成立以前而言，也许应该首肯的。

杜威在中国的讲演集成本子的，大致有：

江苏省立第二师范学校（上海）新学社编印：《杜威在华讲演集》，1919。

《杜威五大讲演》（在北京的系统讲演）<sup>②</sup>，北京晨报社，1920（至 1921 年，曾印行过 11 版<sup>③</sup>）。

《杜威三大演讲》（在南京的系统讲演）<sup>④</sup>，上海泰东图书局，1920 年初版，1921 年二版、三版。

杜威演讲、刘伯明口译、沈振声笔述：《教育哲学》（含 22

① 吴俊升：《增订约翰杜威教授年谱》，第 62 页。

② “五大讲演”，包括《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》、《教育哲学》、《思想之派别》、《现代的三个哲学家》和《伦理讲演纪略》。“五大讲演”是 1919~1920 年在北京的系统讲演。其中，《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》、《思想之派别》和《现代的三个哲学家》是在北京大学法科礼堂讲的；《教育哲学》是在当时北京教育部会场讲的。都是由胡适翻译的。其中两讲：《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》和《教育哲学》，由夏威夷大学教授克洛普顿（R. W. Clopton）与吴俊升合作由中文转译为英文，书名为：*John Dewey, Lectures in China, 1919—1920*，由夏威夷大学出版社 1973 年出版（吴俊升：《增订约翰杜威教授年谱》，第 64 页）。有研究者弄错了，以为是别人而不是吴俊升，其实 1973 年夏威夷大学出版的那本书，在封套和扉页上写得很清楚：*John Dewey, Lectures in China, 1919—1920, Translated from the Chinese and edited by Robert W. Clopton/Tsuin-Chen Ou*。从而也体悟到研究之不易，材料偶一不慎，即来错误，而且还逃过了编辑的眼睛！错误确实难免，但学术研究又决不可躺在“错误难免论”的沙发上。著者、译者、编者总是以最大的努力，力求没有错误。“错误难免”，是读者鉴谅的话，不是属于著、译、编者的。

③ 过去，往往把重印一次称为一版，未必经过译、著内容的修订。

④ “三大演讲”，包括《教育哲学》、《哲学史》和《试验论理学》。



次演讲，26个讲题），泰东图书局，1920年初版，1922年四版。<sup>①</sup>

福建教育厅编：《杜威在福建的讲演》，1921。

郑宗海编译：《杜威的教育哲学》<sup>②</sup>，商务印书馆，1921。

郭智方、张念祖、金海观、倪文宙编译：《杜威教育哲学》（据在南京高师讲《教育哲学》的笔记），商务印书馆，1921。

常道直记译：《平民主义与教育》（据在北京高师教育研究科讲《教育哲学》的英文笔记移译；杜威1921年作序），商务印书馆，1922。

杜威实验主义教育学的内核，比较普遍地融裁吸纳于国人编著的教育学中。如王炽昌编的《教育学》（中华书局，1922，初版；1924，10版），在首页中说：“教育之意义，自来有预备、启发、陶冶诸说，而以近时之生长说较为完善。依生长说而论，则教育一义定为经验之继续改造”，并直言其内容说：“本书于作者意见外，大部分取材于杜威、桑代克、密勒三氏之学说。”心迹坦荡。

又如孟宪承编的《教育概论》（商务印书馆，1933，初版；1947，29版），分10章，其目次为：

- 第一章 儿童的发展
- 第二章 社会的适应
- 第三章 教育机关
- 第四章 学校系统
- 第五章 教育行政
- 第六章 小学组织
- 第七章 课程
- 第八章 教学

---

① 杜威1920年在南京、镇江、常州、上海、南通、徐州等地的讲演，以及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讲的《教育哲学》、《哲学史》和《试验论理学》，是由刘伯明翻译的。

② 杜威1919年在浙江省教育会的讲演，1920年在杭州、苏州等地的讲演，是由郑宗海（晓沧）翻译的。





## 第九章 教学（续）

## 第十章 教师的专业（按：含“教育的研究”）

教育总是儿童与社会之间的桥梁。教育总是在儿童的发展与社会的适应中效力的。然而，教育从儿童出发还是从社会出发，却是两种不同的观点。传统教育学多首先强调社会的适应，进步教育学则首先注视儿童的发展。这本《教育概论》是“从受教育的儿童说起”的，是从儿童的发展与社会的适应两个方面展开，先用华生（J. B. Watson）、桑代克（E. L. Thorndike）、比纳（A. Binet）等人的学说，佐证儿童的生长与发展，从而肯定杜威“教育即生长”的观点。再用教育学家的名言说明“生长是向着将来的继续的前进，是对社会环境的继续的适应”。它把杜威的“教育即生长”、“教育即生活”、“学校即社会”的思想会通于自己的著述，并指出了：“教科书不过是‘最低限的教材’；教者固然应该有补充的引申阐发的可能，学者尤有按着自己能力补充阅读和讨论的必要。”这本《教育概论》的作者厚积薄发，言简意赅，小32开本只178页的薄本子，蕴涵了大量的教育理论与实践问题，而且从容潇洒，具有自己的风貌，洵为高手。孟老曾对我说过，这本“小书”倒还反映他的一些“想法”；并说他的另一本合编的《教育通论》，则是根据当时《师范学校课程标准》的凑合之作而已。

再如吴俊升、王西征编著的《教育概论》（正中书局，1935，初版；1946，50版），分五篇十二章，其目次为：

### 第一篇

第一章 儿童的发展

第二章 学习的功能

第三章 社会的适应

第四章 教育的意义

第五章 教育的目的

### 第二篇

第六章 教育机关（上）